

战后东南亚华人经济

广东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书系

广东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

ZHANHOU
DONGNANYA
HUAREN
JING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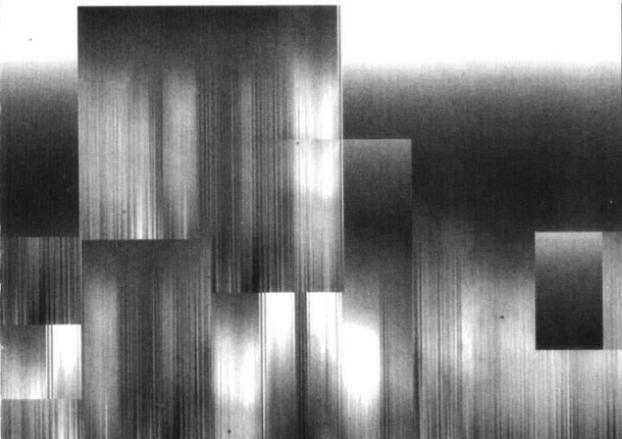
■ 黄滋生 温北炎 主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

战后东南亚华人经济

广东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书系
广东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
广东优秀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ZANHOU DONGNANYA HUAREN JINGJI



■ 黄滋生 温北炎 主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钟永宁

封面设计：张永齐

责任技编：黎碧霞

战后东南亚华人经济

主编 黄滋生 温北炎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印刷

(厂址：韶关市西河工业东路33号)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11.25 印张 220,000 字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8-03007-6/K·666

定价：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作为“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迁”这个研究课题的亚项目，我们在1988—1989年与广州华侨研究会合作撰写和出版了《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暨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接着，又组织人力，分工撰写另一个亚项目《战后东南亚华人经济》，原来打算在“八五”前期出版，岂料好事多磨，碍于各种主观客观原因，直至今天才与读者见面。

中国人移居东南亚，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从开始寓留、定居东南亚时起，他们便将自己的才能和智慧、经验和技术贡献给当地社会，与所在国人民一起开发当地经济，发展所在国社会的生产、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对所在国内部经济交流和对外经济交往，因而也就对所在国的社会发展、统一市场的形成，在不同程度上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既有史实的支持，也为世人包括华人所在国人士所肯定。

在积极参与当地经济开发过程中，中国移民及他们在寓居地繁衍的后代，即我们今天所称的华侨、华人，也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经济事业。而且，由于他们具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勤俭节约、铢积寸累的艰苦朴素作风，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由中国社会中特别强固的宗法观念、血缘地缘关系所形成的人际、业际网络，因而他们在海外的事业在总体上得以不断发展、扩大。

与抱有种族偏见的某些西方、华人所在国的人士所谓华人经

济是独立于当地经济的侨民经济的武断说法相反，华人经济一开始就是因应当地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因而它从一开始就作为当地经济生活的补充，成为当地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像西方国家的资本那样，将在东方国家所赚取的利润（更不必说它们在东方国家掠夺的财富了）汇回母国，藉以增殖其对东方国家一无裨益的一己财富和资本，而是将其经营所得的大部以再投资的形式留在居留地，以扩大其在所在国的经营，帮助所在国社会的发展。因而，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说，华人的经济事业是服务于当地社会的，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华侨绝大部分成为所在国公民，其子孙辈完全融入当地社会，东南亚华侨社会因而历史性地转变为华人社会的条件下，情况尤其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南亚华人经济，是以战前的华侨经济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但由于战后东南亚国家已拥有完全的国家主权，并先后为发展本国经济而对本国公民（包括华人）和华侨投资采取鼓励性措施；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关系的趋于改善，国际间经济联系日趋密切，这就为东南亚国家华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因而它们以空前的速度向纵深发展，向现代经济的一切领域推进，甚至超出居住国的范围，走向国际。今天，东南亚华人经济已发生了质的量的飞跃，远非战前的华侨经济可比了。近三几十年东南亚相当部分国家经济上的迅猛发展，其中包含了华人经济界有目共睹的贡献。

追述和分析战后东南亚华人经济发展的进程和原因；说明战后华人经济对所在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正是本书撰写目的之所在。

本书所用的“华人”一词，一般情况下含华侨、华裔和外籍华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至 60 年代甚至 80 年代初期），除马来西亚、新加坡外，在东南亚其他国家

家，华侨在华人中仍占大多数，因此在这一时期，我们在表述中一般都用“华侨”、“华侨经济”两词；60—80年代以后，在华人中华裔和外籍华人已占压倒多数（90%以上），在表述中即改用“华人”、“华人经济”两词。行文中偶有出现的“华侨社会”、“华人社会”，与上述情况相同。在论述中需将华侨与拥有所在国公民身份的华人的情况相区别时，则分别用“华侨”、“华人”两词表述。

参加本书撰写的有温北炎教授（第一章）、廖小健副教授（第二、四章）、王绵长副教授（第三章）、黄滋生教授（第五章）、林锡星副教授（第七章）和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邓水正副研究员（第六章）。全书由黄滋生统稿。

本项目被列入广东省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在研究过程中获得美国黄兴基金会薛君度教育基金的有力资助；在出版时又得到广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支持；詹家豪同志对本书的修改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在本项目研究过程中，卢美娟同志做了大量辅助工作，特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内容未妥之处，祈请批评指正。

黄滋生
1998年4月
于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战后印尼华人经济	1
第一节 战前和战后初期华人经济情况	2
第二节 华人经济发展变化的背景	6
第三节 华人经济的特点	15
第四节 华人经营的行业和华人财团简介	20
第五节 华人经济的发展前景	36
第二章 战后马来西亚华人经济	51
第一节 战前马来西亚华人经济回顾	51
第二节 战后华人经济的几个发展阶段	52
第三节 战后华人经济的发展变化	64
第四节 主要华人企业集团	71
第五节 华人经济的地位及面临的问题	84
第六节 九十年代的马来西亚华人经济	89
第三章 战后泰国华人经济	103
第一节 泰国华人经济的前身及其演变	103
第二节 战后泰国华人经济成长的条件及其发展的 阶段性	111
第三节 战后泰国华人企业集团的发展趋势	123

第四节	泰华百业现状、华商资本实力及华人经济团体.....	138
第五节	泰华资本家的未来投资走向.....	143
第四章	战后新加坡华人经济.....	155
第一节	战前新加坡华人经济发展回顾.....	155
第二节	战后新加坡华人经济的几个发展阶段.....	159
第三节	现阶段新加坡的华人经济.....	171
第四节	主要华人企业集团.....	178
第五节	对新加坡华人经济的评估与展望.....	189
第五章	战后菲律宾华人经济.....	199
第一节	战前的菲律宾华人经济.....	199
第二节	战后初期华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203
第三节	菲化政策及其对华人经济的影响.....	216
第四节	现阶段的华人经济.....	223
第五节	主要华人大企业家简介.....	236
第六章	战后越南华人经济.....	258
第一节	战前越南华人经济的回顾.....	258
第二节	战后至七十年代中期华人经济的演变.....	266
第三节	南方解放至越共“六大”前的越南华人经济.....	276
第四节	越南全面改革开放后的华人经济.....	282
第五节	越南华人经济发展的趋势与展望.....	294
第七章	战后缅甸华人经济.....	300
第一节	战前华人经济的基本状况.....	300
第二节	战后至八十年代的缅甸华人经济.....	305
第三节	现阶段的缅甸华人经济.....	340

第一章

战后印尼华人经济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人口达1.9亿，居世界第四位。印尼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非常丰富，发展潜力很大。印尼在东南亚不仅是个政治大国，而且也是一个经济发展迅速的大国。70年代，印尼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7.8%。80年代以来，印尼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争取外国投资，增加外贸出口，成绩举世瞩目；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普遍提高，通货膨胀率在10%以下。1994年国民生产人均值已达920美元，属中等收入国家之列。据世界银行报告，印尼正处在成为新兴工业国家的过程中，一些西方国家把印尼列为亚洲七条“经济小龙”之一^[1]。

印尼华人六百多万，居世界各国华人人数之首。他们绝大部分已加入当地国籍，认同于印度尼西亚，逐步融入当地社会，成为当地的少数民族。印尼华人虽然只占这个国家人口的3%，但在经济上举足轻重。华人经济已成为当地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印尼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印尼华人的经济活动是华人社会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活动，是华人长期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考察和研究战后华人的经济发展和变化，可全面和深刻了解战后印尼华人社会的发展变化。本章重点介绍和分析战后印尼华人经济发展变化的背景、特点和各业的发展情况，并探讨华人经济的发展前景。

第一节 战前和战后初期华人经济情况

从 1600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荷兰殖民者统治印尼达 350 年之久。从 20 世纪初到第二次大战前的几十年，是荷属东印度华人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华人人口增长非常迅速。19 世纪末，华人人口还不足 50 万，到了 20 世纪初，尤其是 1920—1930 年间，由于中国军阀混战，灾荒频繁，民不聊生，新移民大批涌入印尼，人数达到 123 万人^[2]。到了 30 年代，因世界经济危机影响，荷印政府限制新移民入境。日本占领印尼时期，更没有新移民入境，华人人口的增长，主要是靠自然繁殖。华人人口的迅速增长，对战前荷印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战前的荷印经济，已经不是荷兰一家垄断的经济。由于西方各国资本大量涌入荷属东印度，并展开激烈的争夺，荷印政府自 1905 年起被迫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荷兰和西方各国资本共同掠夺这块富饶的殖民地。根据纽约怀特工程公司 1953 年出版的《关于印度尼西亚经济的报告》一书提供的材料，战前印尼的外国资本共 21 亿美元，其中 70% 属荷兰资本，12.5% 属英国资本，10% 属美国资本，5% 属法国和意大利资本，2.5% 属其他国家资本。

战前，华人经济受到荷印政府和西方各国资本的限制和排斥，地位十分脆弱。华人勇于开拓，吃苦耐劳，克勤克俭，较多从事零售商业、中介商业、农业和中、小型工业，尤其是零售商业和中介商业相当活跃。这对沟通城乡经济，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

根据荷印政府 1930 年人口调查统计，华人总人口 123 万，其中有职业者 46.9 万，占总人数的 38%。在有职业的华人中，

从事商业者最多，占 36.6%，从事原料生产者占 30.8%，从事工业生产者占 20%，从事交通运输业者占 2.7%，自由职业者 1.5%，公务员 0.7%，其他人员 7%^[3]。

荷兰统治时期，华人经济主要处于中介地位。欧洲人作为批发商、进出口商处于最上层；身为农民、渔民、零售商和工人的原住民处于最底层；而华人作为分配物品的中介商则处于中层并为这两者服务。他们从欧洲人那儿贩来消费品卖给原住民，从原住民那儿收购原料和土特产卖给欧洲人^[4]。

华人积极参加当地的开发事业，经营橡胶、椰子、胡椒、烟草、甘蔗、咖啡、茶叶种植园等，促进了当地的生产，繁荣了当地经济。华人这种开拓精神和勤劳勇敢的美德，连殖民当局也给予肯定。前荷兰殖民大臣阿尔丁·梅斯说：“华侨商人的发财致富，一般是由于勤劳和善于经营。他们爱好劳动，这是他们用以达到目的的方法。在这方面，他们表现了坚韧的精神，世界上没有任何民族能够比得上他们。”^[5]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占领印尼长达三年半（1942 年 3 月至 1945 年 8 月）之久。日本占领军的残酷掠夺，使印尼经济遭受到极大破坏，华人经济也受到严重的摧残。

1945 年 8 月 17 日，印尼宣布独立。但荷兰殖民者不久即卷土重来，发动两次“警卫行动”，妄图扼杀印尼的民族独立运动。这样，日本占领时期被破坏了的经济还未恢复过来，复又遭到进一步的破坏，使这个时期华人恢复经济的活动举步维艰。

荷兰殖民者的“警卫行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1950 年，被迫将主权移交给印尼。但此后由于西方殖民者对新生共和国的干涉仍未停止，国内各派政治力量斗争也相当激烈，一些军人和政客在苏门答腊北部和苏拉威西北部搞分裂活动等原因，印尼政局一直动荡不定，苏加诺政权（1950—1965 年）因而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

印尼独立后，民族主义者接管政权，民族主义情绪开始高涨。苏加诺政府在“经济民族化”目标下，在经济建设中强调自力更生，依靠本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拒绝西方国家投资和贷款，接管荷英等外国企业，实行外资企业国有化。与此同时，又限制和排斥作为国内民族资本的华人资本。他们不但没有正确认识华人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反而片面认为华人经济是“殖民经济的残余”，华人经济控制了印尼的工商业；加上民族工商业家当时强烈要求以发展原住民经济来取代华人经济，政府因而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和排斥华人经济的政策法令，其中主要的有如下六项：

1. 实施“堡垒政策”。1952年5月，政府将进口商分为堡垒组（民族进口商）、籍民组和外侨组三类，规定凡资本70%属原住民的企业属堡垒进口商，由政府给予各种特权和优先权。这一政策执行的结果，在1953年的进口总值中，民族进口商所占的份额从40%上升到76.2%，外籍商（主要是华商）从59.2%下降到23.8%。印尼原住民中的一些人还极力要将进口业领域的这一政策逐步扩大到其他经济领域，以收回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的印尼经济控制权，最后由原住民掌握印尼经济控制权^[6]。

2. 1954年6月，政府颁布关于限制外侨碾米企业的第52号条例，规定“碾米企业资本必须是印尼籍民的财产，除印尼籍民外不得由别国籍民掌执；有关企业的一切权力均不得落到印尼籍民以外的别国籍民中”^[7]。当时中国籍华人仍占华人的多数，印尼90%以上的碾米厂由华人经营。如在1952年，在东爪哇地区的154家碾米厂中，就有138家属于外侨首先是华人所有。华人经营的碾米厂由于受此条例影响而纷纷倒闭。

3. 1957年7月1日，政府颁布关于外侨税的第16号紧急法令，规定外侨家庭成员每年的税额是家长1500盾，未成年成员375盾，初生婴儿也须纳税^[8]。外侨税无疑加重了华人的经济

负担。一个家庭以 5 口人计算，平均每人税款为 800 盾，就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政府在解释这一法令时申明，外侨收入不足维持自身与家庭生活者，移民厅可将他们驱逐出境。这可视为印尼政府制订并执行这一紧急法令的目的所在。

4. 1958 年 6 月，政府实施外资工商业登记条例，规定 27 种外资企业在一定年限内须移交给民族工商业者经营。这些企业包括纺织厂、烟厂、印刷厂、冰厂、橡胶厂、碾米厂、巧克力厂等。此外，又规定凡领取营业执照的外资企业须缴纳定额的保证金。以上外资企业大部分由华侨经营。这一条例的执行，对华侨工商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5. 没收华人企业。1958 年 10 月，政府决定没收台湾系的华人企业，在雅加达被接管的企业包括报社、戏院及电影院等共有 15 家。1959 年接管台湾系华人开办的 13 家银行。1961 年 7 月，三宝垄法院以黄仲涵所创办的建源公司“抵触外汇条例”为理由，没收其全部财产。1961 年 3 月，泗水法院以“违反外汇条例与紧急条例”为理由，没收华人韩乾记 1.5 亿盾的产业。

6. 1959 年 5 月 14 日，印尼商业部长慕约米塞诺颁布条例，规定在县市以下乡镇经营的外侨小零售商（又称亚弄商）一律限于年底结束营业。根据这一条例，苏加诺总统于 1959 年 11 月 18 日颁布总统第 10 号法令，并规定其实施日期为 1960 年元旦。据印尼政府调查，在印尼的外侨商店共 104 875 家，华人占 90 466 家，其中小零售商 80 400 家，资本 23 亿盾，占印尼全部外资的 16.5%。这八万多家小零售商中，约有一半散布在县市以下的乡镇，因而受这个法令打击的华人小商小贩人数在五十万以上^[9]。受这一法令影响不能在乡镇谋生的华人，势必迁至县市；但许多地方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华人移入市区，以致这部分华人陷入走投无路的惨境，过着难民的生活。由于这项排华法令的实施，十多万华人被迫离开印尼，返回中国大陆；印尼经济也

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城乡物质交流受阻，经济生活混乱。

总之，苏加诺执政时期，印尼为了发展民族经济，虽然曾作出某些努力，如 1951 年制定和实施“工业紧急计划”，1956 年实施“五年建设计划”，1961 年实施“八年全面建设计划”，但由于当时国内政局不稳，经济基础很薄弱，政府忽视农业和轻纺工业的发展，华人经济活动受到限制和排斥等原因，印尼经济没有明显的增长，人民生活贫困。1954 年至 1960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 3.1%，1961 年至 1965 年下降为 1%。1965 年至 1966 年经济滑坡，工厂开工率仅为 20%，财政赤字达 15 656 亿盾，外汇储备仅 800 万美元，而外债却高至 23.58 亿美元，通货膨胀率达 650%，人均国民生产值只有 90 美元^[10]。

政府加意发展的印尼经济尚且如此，受苏加诺政府限制和排斥的华人经济的发展之缓慢，就不在话下了。

第二节 华人经济发展变化的背景

一、印尼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化

苏哈托 1965 年执政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重点发展经济。为此，苏哈托政府积极利用外资和外援，把利用外资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一项基本国策；大力开发石油和天然气，把它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业方面大力发展替代进口工业和出口产品加工工业；农业方面重点发展粮食生产；积极扩大对外贸易，大力增加天然气产品出口。由于当局大力发展经济，加上国内政局稳定，印尼经济发展迅速。这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经济发展速度加快。1965 年，苏哈托上台执政，经过三年时间稳定经济后，于 1969 年开始实施第一个建设计划。到 1994 年，已完成了五个五年建设计划，这 25 年是印尼第一个建

设长周期。1995 年实施第六个五年建设计划，作为第二个 25 年建设周期的开始。在头 25 年内，经济增长率年平均达 6.8%，第五个五年建设计划（1989 年 3 月至 1994 年 4 月）为 6.9%，超过了原计划的 5%。头 25 年内工业增长率年平均 12.4%；农业 3.6%；出口增长率年平均 15.9%，即 25 年中增长 42 倍；非石油与天然气产品出口增长率为 16.5%，即增长 48 倍^[11]。

第二，着力吸收外资，以之作为经济建设的动力。1967 年，印尼政府颁布给予外资诸多优惠的《外国投资法令》，把吸收外国投资和外国贷款作为五年建设计划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印尼外国投资协调机构提供的资料，1967 年至 1994 年，外资协议投资 917.85 亿美元，3 092 个项目，但实际投资 274 亿美元（占协议投资的 30%），1 704 个项目，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1994—1995 年世界债务一览表》，印尼 1993 年外债总额 895.39 亿美元。但印尼政府偿还外债的能力逐年增强，年偿还总额达 132.98 亿美元。印尼利用外债发展基础设施，如公路、港口、码头、电力、通讯设施等。结果，人力资源得到开发，就业机会得以增加^[12]。

第三，产业结构发生变化。25 年的经济建设，使工业在国民生产中所占比重从 1969 年的 9.2% 上升至 1994 年的 22.3%，1991 年开始超过农业的比重。1994 年（第五个五年建设计划最后一年），工业已发展到 400 种，已有 4 000 种工业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农业所占比重从 1969 年的 49.3% 下降到 1994 年的 18.5%。1971 农业部门劳动力占 64.2%，1990 年下降至 49.9%。

第四，基础设施有较大的发展。根据印尼政府公布的资料，至 1993 年，有公路 24.4 万公里（包括国道，省级、市级和县级公路），机动车辆增长 20 倍；海运已拥有 3 个集装箱港口，127 个供货物出口的港口码头；航空港从 108 个增至 146 个；电力方

面，1971 年每 100 户居民只有 6 户有电灯照明，1993 年则已超过一半住户、一半农户有电灯照明；电话拥有量从每万户只有 15 部增加到 159 部，增加十倍多。

第五，经济建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变化。

首先，全国人口增长呈下降趋势。由于推行计划生育运动，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号召得到大多数人的响应，人口增长有所放慢，1994 年下降到 1.7%。与此同时，经济的增长却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仅 1991 年至 1994 年就提供了 4 440 万个新岗位。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福利也提高了。印尼独立前，寿命平均约 42 岁，1970 年为 46 岁，1994 年达 63 岁^[13]。

其次，教育事业发展迅速。1969 年，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7—12 岁学龄儿童只有 40% 念小学；1993 年，这学龄段的儿童几乎都进了小学。初中学生增长六倍。高中学生 1968 年只有 48 万人，1993 年达 420 万人，占 16—18 岁青少年的 1/3。1968 年只有大学生 15 万人，1993 年达 230 万人，占 19—24 岁青年的 10%。扫盲工作也取得成就，十岁以上文盲人数在居民中所占比例，从 1969 年的 39% 下降至 1993 年的 14%。

再次，经济建设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 25 年间，兴建了 85.5 万间简易住房，在 3.7 万个农村修建 55.8 万间住房。1969—1993 年，饮用清洁水的城市居民从 20% 猛升至 80%，农村居民 1993 年也达到 50%。每 10 万人中的医生数量，1968 年只有 4 个，1993 年已升至 17 个^[14]。

二、苏哈托政府对华人的经济政策

由于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不同，苏哈托政府对华人的经济政策与苏加诺政府有着很大的区别。

苏哈托总统执政后，起用一批 50 年代末毕业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经济专家，制定开放政策，采取重点发展经济的方

针，积极利用外资和外援，大力开发石油、天然气和森林等资源，发展工业，扩大外贸，促进粮食生产。为了利用华人的经济力量促进经济建设，苏哈托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华人经济的政策法令，总统本身也发表许多有利于华人经济的言论。现将其要者概述于下。

1967年初，政府颁布《外国投资法》。该法鼓励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联合经营，规定凡投资25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可免缴所得税两年，且不限制投资者将利润汇寄国外。受这一优惠政策的刺激，美、日、新加坡和台湾、香港的资本迅速涌入印尼。外资乐于同华人企业联合经营，因为华人企业信誉可靠，工作效率高，有广泛的商业网，能提供银行贷款许可证。这一法令大大促进了华人经济的发展。

1968年7月，政府颁布《国内投资法》，决定利用印尼本土所积累的资金发展民族经济。法令将企业分为民族企业和外资企业两种，民族企业指印尼公民拥有51%股份的企业，未达到这个标准的企业称为外资企业。上述条例规定，外侨商业企业，可以经营到1977年12月31日；工业企业，可以经营到1997年12月31日；其他企业经营期限为10年至30年。1977年以后，外侨商业必须转为工业。印尼政府积极鼓励外侨商业转为工业，从而促进华人资本由商业向工业领域转移^[15]。这一政策的颁布，表明政府非常希望动员和利用国内外资本，以发展印尼经济，实现国家的建设计划。

苏哈托总统对华人资本有了新的看法，并采取了新的态度。1967年6月7日，苏哈托签署《关于解决华人问题的基本政策》的总统第37号法令。法令指出：“与1967年第1号法令所规定的‘外资’不同，在印尼本土积累起来的财富被列为‘国内外侨资金’。此资金实际上是外侨手中的印尼民族财富，因此有必要加以动员，并利用于发展建设方面。”^[16]